试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田汉云

As the founder of the Changzhou New Text School, Zhuang Cunyu broke through the barrier of simple annotation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Correct Ver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qiu zhengci) which created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political theory. This system of political theory was, without a doubt, suited to the actual social demands of that time. Zhuang' s compassionate concern for his times was evident in the renewed advocacy of "the utility of statecraft" and his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holarly style.

常州今文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清代后期的政治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一学派的许多学术名家在本世纪一直受到治清学史者高度重视。关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研究持续展开，产生了不少有深度的论著。相比之下，对于这一学派开创者庄存与的研究至今还显得较为薄弱。据台湾学者林庆彰等所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统计，从 1900 年至 1993 年间，中国和日本学者发表研究庄存与的论文仅有 10 篇。笔者所见 1993 年以后发表的有关论著，为数亦甚少，评述稍详者当是陈其泰《清代公羊学》①之有关章节。我们要推进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庄存与学术的论析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在庄存与的多种经学著作中，称得上常州学派奠基作的是《春秋正辞》②。这部著作是庄存与在辛勤探索的基础上，对内容丰富庞杂的儒学文化加以选择整合最重要的成果。它确立了《春秋》公羊学派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本书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对这一学派后继者影响深远。因此，剖析《春秋正辞》，对于研究庄存与学术和研究整个常州学派，都是必要的。

一、汉宋论争格局中的独特选择

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③是综论清代学术的同名杰作，两位先生关于清代前期经学都有独到见解，但是又大有差异。梁启超说：

> 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汉学派殆占全胜。

他所注重的是汉学与宋学两派的斗争，从而指明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基本格局。而钱穆说：

>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他别标新解，突出宋学一派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强调宋学对汉学的渗透。他的论述诚不足以否认汉宋对立与斗争是学术界的基本态势，却提醒我们看到，纵然在汉宋之争最为尖锐的时期，依旧存在着汉宋交融渗透的情形。钱先生举例虽有失宜，见解却不失精奇。

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本质上还是儒家文化系统内部的学派论争。就双方的根本目的说来，都是要进一步强化、以更好地实现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但是，双方所依循

的学术思路大相径庭。宋学家主张劝诱人们增进心性修养，进而成为统治者的忠顺臣民。汉学家期望引导统治者改良社会政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有的学者把汉、宋之争归纳为礼学与理学的论争④。

自宋代至明代，理学的影响非常深广。清朝建立，统治者为征服人心，确立了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当时统治者所谓儒学，主要是指宋明理学。康熙帝玄烨自身“夙好程朱，深谈性理”，还重用徐乾学、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家。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清初讲倡理学的风气较之明末更为盛行。清代理学家的性理之学，在总体上远不及宋明学者，而且也没有构建自具面目的思想体系。他们所做的工作，其作用主要在于维护道统的权威。应当承认，有些理学家精研性理，而且能躬行不懈，因之以道德高尚见重于世。不过，更普遍的现象是谈理学者并不注重个人操行。《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二十三：“今汉官内有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李光地，全祖望痛斥其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⑤据方苞说：“自公在位时，众多诮公，既殁，诋讦尤甚。”⑥李光地于方苞有恩，方氏既如此说，足见李氏在当时名声不佳。康熙帝玄烨又说：“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自文其陋，岸然自负为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人之见，真可鄙也。”⑦这种激愤的话语表明，风行于世的理学在统摄人心的效能方面作用比统治者所期望的要低得多。与此同时，汉学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驳诘，也削弱了宋学的影响。总之，清朝统治者很难依赖理学进行思想统治。

关于理学之不足以治世，应当说汉学家始终是持这种见解。汉学家以顾炎武为宗师，而顾氏已云：

>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⑧

顾炎武也赞同这样的说法：

> 今之学者……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⑨

顾炎武对理学末流的批判与康熙帝玄烨的认识显然有一致处。区别在于，康熙皇帝要求宗理学者能够躬行不悖于所学，而顾炎武则要求以经学取代理学。

汉学家的学术理想是要恢复正宗的古代儒家学说。因此，他们设想的理论建设路径，是以考文证史为基础，进而求得对儒家经典的确解，最终揭示孔孟之道。清代考证学的发展、繁荣与这种学术思路是密切相关的。汉学家治经，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学风严谨而具有一定科学性。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的重要收获：一是对经典的训释，其精确程度不仅超过宋人而且也出乎六朝与唐代经师之上。二是对两汉经学遗产的发掘整理，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然而他们的工作进展与最终目标相去甚远。如顾炎武、戴震、焦循、阮元等人对先秦儒学的义理确有发明与发展，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对儒家学说作出系统的阐述。方东树作为宋学家后期代表人物之一，指责汉学家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却不免“其生也勤，其死也虚”⑩，因为他们所崇尚的两汉经学本不如宋学精微周密。方东树的评论自不免门户之见，坚指汉学一派在儒学理论建设方面相当薄弱，还是符合实际的。汉学一派在依托先秦两汉学术进行儒学理论重建方面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两汉及先秦儒学本来就是复杂的学术文化。今、古文两大学派所宗经典不尽相同，所持学风差异甚大，在政治理论方面也颇不相合。汉学家既然讲求“实事求是”，就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在对今、古文经学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之前，选择难，整合更难。

经过将近百年的努力，汉学一派取得了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广泛影响。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指出，康熙朝“御定”经典注解多宗宋学。乾隆朝“敕撰”的经解则转重汉学。于《诗》依据毛传郑笺，“事必有征，义必有本，臆说武断，概不取焉”。于《礼》以郑玄注为宗，“探孔、贾之精微，综群儒之异同”。于《春秋》，“采三家之精华”。于《易》，务求“发明古义，不涉虚渺之说与术数之学”⑪。

但是，在理学衰弱汉学兴盛的清代中期，对儒家文化进行选择整合的必要性却愈加凸显。国力的空前强盛使得统治阶级渴望维持“盛世”光景，而局部地区的社会动乱、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西方列强的侵扰渗透，都是最高统治者的深重隐忧。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

要手段之一，便是强化思想统治，具体说亦即适应当代需要重建儒学理论体系。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从根本上看是满足统治阶级这种紧迫需要的一次尝试。

庄存与主要生活在雍正、乾隆两朝。他的学术道路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变迁大体保持一致。据臧庸记述，庄存与“幼禀庭训，习朱子《小学》、《近思录》”；青年时期受业于舅氏钱某，“力采经史百家”；中年以后“益沉潜经义”。[12]在雍、乾两朝，汉学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宋学则处于被轻贬的境地。庄存与不似偏激的汉学家那样对宋学予以断然弃绝，研究的重点却也明显地经历了由理学至汉学的转移。

在汉宋之争持续展开的过程中，庄存与采取了独特的学术立场。他坚持通过独立思考决定自己对古代学术遗产的弃取，给世人留下非汉学亦非宋学、似汉学亦似宋学的印象。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庄存与的学派归属便难以确定，因此两篇中皆未立传。阮元的《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具论庄存与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成就及特点，指出他对汉、宋诸儒都有取舍。魏源称，庄氏学术，“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13]。总之，清朝学者多以庄存与的经学为不同于汉宋两派的“别派”。

庄存与是位非常勤奋的学者，平日以读书为乐，“口吟手披，率至夜分始就寝”。他一生撰有经学论著多种，几乎每种经典都有研究心得。在他的著作中，最能代表其学术成就的是《春秋正辞》。他的其他论著与同时代人的经义著述相比体类不殊，且未见高胜。所以阮元编《皇清经解》，仅收《春秋正辞》等有关《春秋》研究的三种。

可以说，是《春秋正辞》奠定了庄存与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可以从多方面评析，但是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一是选择了一种儒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学术道路。世所公认的儒家经典有 13 种，长期积累的传注资料卷帙浩繁。经典中的义理本有歧异，历代儒者解经时“各安其意”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要从中清理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诚为不易。庄存与选择《春秋公羊传》为依据，以其余经传为辅翼，这样便摆脱了今古文之争和汉宋之争的困扰，使得理论构建的可操作性更强。

二是提供了一种儒家政治理论的表述形态。《春秋正辞》是系统总结儒家政治学说的一部书，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作具体分析。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春秋正辞》既不像董仲舒那样自著一书自由地发挥《春秋》的政治思想，也不像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那样随文释义，令学者难知经书的思想体系。他是拆散经传之思想资料，区析类例，寻其义旨，从而拟构出特定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

三是对《春秋》公羊学的重新发现。《春秋》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盛行于世。如果说儒学在西汉中后期是充当社会主流文化的显学，公羊学足称显学中的显学。但是自东汉以后，随着古文经学优势地位的确立，属于今文经学的公羊学景况大不如前。有人用“千年消沉”形容公羊学的历史命运并不过分。庄存与著成《春秋正辞》，使公羊学研究水平显著提高，使公羊学的学术价值再度为世所重。晚清的有识之士标举公羊学的旗帜，倡导社会改良，推动社会进步，此一潮流实由庄存与导夫先路。

二、经传诠释与经纶世务

当年，庄存与书斋中有自作联语云：“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己问作耳闻圣贤在坐。”这两句话很透彻地标明了庄存与卓越的学术理想与独特的治学风格。

庄存与经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字句训释与名物考辨，而在于把握经典的基本思想。这种学术追求在他的全部经学著作中都有体现，但是在《春秋正辞》中反映得最为充分。从理论上说，考据训诂的终极目标也是把握义理，只是在汉学的极盛时期，考据训诂的作用被夸大了。戴震说过：“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14]方东树认为，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既有不待训诂而可明者，又有虽经训诂仍难明者。这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有不少汉学家终身专务考据训诂，于义理少有深刻见解。考据学极盛的乾隆时期，思想领域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况，这也表明考据训诂既不等于也不能代替理论研究。汉学一派的经学研究，考据训诂的成就远远高于义理阐释，这是显著的事实。不过，也还应当承认，考证训诂的丰硕成果及若干治学方法，

为儒家经典的理论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庄存与所谓“玩经文”包含了对朴学研究实绩的承认，所谓“存大体”、“理义悦心”则意味着对当时朴学局限性的洞明，意味着抱有超越朴学的雄心。

庄存与重视义理研究，确有受宋学影响的成分。他认为修身与治学是互相关联的，“学以养其良心，益其神智，须旁广而中深，始能囊括群言，发其精蕴”[15]。这种认识，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朱熹所谓“居敬穷理”。朱熹云：“学者功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16]庄存与对朱熹学术下过功夫，两者观念的近似当是相承而非暗合。考虑到他立身处世极为重视自身心性“涵养”，这种分析不为附会。至于如何发明经典之“精蕴”，主要是春秋公羊家的治学方法给予他一定启迪。如所周知，公羊家诠释《春秋》，最重讲论“微言大义”。庄存与强调，读经书，要“力争乎毫厘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在细微隐约处研寻大义，这是公羊学派的作风。庄存与继承了汉代公羊学与宋代理学重视义理研究的传统，在扬其长的同时又注意避其短。他讲究以学养心，却不偏重于言心言性；注重微言大义，却不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论其独到的长处，是把朴学家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义理研究的实践中。所谓“若己问作耳闻圣贤在坐”，正是表明不尚空谈、不事附会的学术情怀。《春秋正辞》在治学方法上的优点和特色正在于此，从内容上看也堪称极优秀的解经之作。

《春秋正辞叙目》云：“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17]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明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庄存与称自己的著作是赵汸《春秋属辞》改编本，表现出正直学人的谦逊美德。其实，《春秋正辞》与《春秋属辞》大有不同。《春秋属辞》主要研究《春秋》笔法，《春秋正辞》主要条列《春秋》的思想内容。

《春秋正辞》全书共九篇：《正奉天辞第一》、《正天子辞第二》、《正内辞第三》、《正二伯辞第四》、《正诸夏辞第五》、《正外辞第六》《正禁暴辞第七》、《正诛乱辞第八》、《正传疑辞第九》。这九篇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庄存与以社会政治结构为主线，以天子为中心，拟构出《春秋》政治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天子奉天承运，应思德配天地；王者“承天以抚万邦”，自诸侯至于庶民都应服从，而不可僭越违忤；王者对于家族，诸侯之与臣民，都应齐之以礼；齐桓、晋文号为“二伯”，因为虚尊王室，故而“救罪不暇”；华夏诸侯，当以各安其分为善，不得“强凌弱、众暴寡”；夷狄之人，不可一概排斥，或褒或贬，览观其德；夷狄施暴猾夏，必须明行“天伐”；诸侯作乱虐民，必须“遏之绝之，及殄灭之”。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天人相应，上下有序，内外有别，应当说这些都符合儒学理论中固有的思想原则。

全书九篇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每一篇又构成一个分支性观念体系。现举《正天子辞》一篇为证。本篇“叙论”共列述王者执政的25个要点：一，正王伐；二，正王守；三，正王出；四，正王居；五，正王入；六，正王崩葬；七，正王世子；八，正王子；九，正王后；十，正王姬；十一，正王母弟；十二，正王臣内难；十三，正王臣外难；十四，正王使；十五，正王臣会诸侯；十六，正王会陪臣；十七，正王臣卒葬；十八，正王臣私交；十九，正王师；二十，正王都邑土田；二十一，正王畿内侯国邑；二十二，正王命伐国；二十三，正朝王；二十四，正锡命；二十五，正大夫见天子。这实际上是一篇《春秋》“君道论”。庄存与主要根据公羊学观点，论述了天子立身、待家人、待群臣等方面守常、应变的原则和方略。其余各篇的内容，构成形态与本篇相近。

在经学史上，有不少学者都承认《春秋》中蕴含着系统的政治理论。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与司马迁同时的壶遂云：“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8]司马迁与壶遂所说，是当时治《春秋》者公认的意见。那么，《春秋》中的思想理论体系究竟是包括哪些内容，又有什么样的结构形态呢？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没有作系统的说明，后来的《春秋》研究者也没有作类似的尝试。庄存与的《春秋正

辞》，是经学史上惟一的紧扣经传总结《春秋》政治思想体系的著作。因此，它在《春秋》学史上应当占有特殊地位。

庄存与对《春秋》政治思想体系的总结，是一项具有独创性的工作。完成这项工作，离不开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借鉴。

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清楚地表明，他解释《春秋》的义理，在三传之中独宗《公羊传》。《春秋正辞》的基本观点在东汉以前的公羊家传说中多有明确表述。因此，庄存与的《春秋》学，是先秦两汉《春秋》公羊学的嫡派。

庄存与以“尊王”为《春秋》之第一要义。这一观点源于《公羊传》的“大一统”论。《公羊传·鲁隐公元年》释经文“春王正月”句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就是说，《春秋》重视诸侯奉周天子正朔，意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9]天下一统，天子方为“生民共主”。天下“尊王”，方可保持“一统”。庄存与视天子为社会的主脑与核心，把握了《春秋》政治思想的纲领。

公羊学认为，“天子”虽为“生民共主”，却只能“受命于天”。董仲舒说：“天执其道为万物主。”[20]所谓“万物”当然也包括“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的命题包含两重意义，一是说天子对生民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二是说天子施治必须符合“天心”。关于庄存与接受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魏源早已揭明[21]。《春秋正辞》中存有大量例证。庄存与谈天子与天之关系，与董仲舒又略有不同。庄存与对于“受命”一说，未曾否认，但有所淡化。他认为，只有开国之君才可称“受命”，而“继世”之君则不可称。他特别强调，君主只有“德配天地”才能保证“元命永固”。这样阐释君权天授，显然隐含着限制和引导君主的良苦用心。由此观之，庄存与援用公羊家的“王者受命”论，既是为“尊王论”提供哲学的支撑，又未尝不是一种内涵上的限定。

《春秋正辞》所阐述的《春秋》政治理论构成，可以归纳为奉天、尊王、理家、治国、接遇夷狄五个层面。其参照系统自然是古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同时也遵循着公羊家的社会秩序和等级论。董仲舒主张的社会秩序规范，是“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何休论社会等级，坚信“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原则符合圣人之心。综合董、何两家之说，便可以构成《春秋正辞》思想理论的框架部分。庄存与《春秋要指》云：“《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依循公羊学去思考“圣心之极”，董仲舒与何休的见解必有参考价值。

庄存与总结《春秋》的政治理论体系，在基本观点方面多得益于《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经说。但是，他在《春秋正辞》之《叙目》中特别指出，赵汸《春秋属辞》对他启发最深。览观《春秋属辞》，我认为庄存与从中所受的启发，主要在辨识《春秋》义理的方法。《春秋属辞》是系统考察《春秋》“书法”的著作。此书共8篇，又分为15卷，卷1至卷7论《春秋》“存策书之大体”；卷8至卷9，论《春秋》“假笔削以行权”；卷10，论“变文以示例”；卷11，论“辨名实之际”；卷12，论“谨华夷之辨”；卷13，论“特笔以正名”；卷14，论“因日月以明类”；卷15，论“辞从主人”。每篇之中，对《春秋》的相关文句搜罗无遗，更作条分缕析。每立一说，必举证据，大有“实事求是”之意。向来说《春秋》书法者，绝无如此详明切实者。《春秋正辞》因经文而求“大义”，必须以通“笔法”为基础。从实际情况看，庄存与认可的《春秋》书法，不出赵汸所说的8种。可以说，《春秋属辞》从研究方法上为《春秋正辞》开辟了一条直寻《春秋》本旨的道路。

庄存与除了接受公羊学的方法与理论，还继承了公羊家关怀世务的致用精神。

《春秋正辞·奉天辞》中论《春秋》的性质，以为“《春秋》应天，受命作制……以托王法……以治万世”。又论《春秋》干预社会政治之方法，以为“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这几句话实际上也是表露自己的心迹。在政治专制非常严酷的清代，庄存与采取这种策略完全可以理解。根据这几句话，我们一方面获得了认识庄氏用世心态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坐实的证释面临着牵强附会的危险性。因

此，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所能指出的乃是庄存与重点阐述的《春秋》“大义”，与现实政治多成对应。

庄存与非常关注皇权传承问题。《春秋正辞·天子辞》总论部分有“正王世子”一节。庄存与的论述含有两个观点：一是应当早定储君，“名号早定，蛊佞不生，贵戚执政，咸有臣志”；二是必须严格教育，使之近正人，闻大道。又有“正王子”一节，其中明确指出：君主对世子与其余诸王子之爱必须有别，否则，诸皇子将“阶而引之，俾毒其正”，世子之位便不能稳定。这两节所持思想观点，在《春秋》经传中可以找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例证，赵汸《春秋属辞》卷13《特笔以正名》已作汇集与评论。可是庄存与对此却不称引经传加以申论。对于这种情况，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有意回避，惟恐涉嫌影射本朝历史上残酷的皇位之争。联系他对“正王后”、“正王姬”的详明述论，对比之下也可以推知他省略其文决非没有原因。再联系《内辞上》论“公继世”的所谓“违莫如深。苟有所见，莫如深也”，其深意大体可知。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云：“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同样的情怀在《春秋正辞》中也有体现。《正内辞下》特立“邦贼”条目，痛斥鲁公子翚，词气峻切，宜有所指。与此相应，《春秋正辞》于任用贤者讲论尤为详明。庄存与不是泛泛谈论“尚贤”，而是着重提出任用“异姓”贤者。他在《内辞下》说到“鲁无异姓大夫”，认为这一点意味着“贤贤之义缺矣”。他坚决反对重要行政职务的世袭，认为“世卿之害家凶国，为王法所必禁”。他在《诸夏辞》中诠释公羊家“贵贱不嫌”，理解为“贵者无常贵，贱者无常贱”。也就是说人不能以出身为依据，只能看德才高下。所谓“昭明德，废幽昏，决然而不可疑也，疑则万不可以少尝之矣！”这里所谓“同姓”、“异姓”，联系清代世情来看，尚不止于比拟爱新觉罗家族与其余家族之关系，更主要的是指满族与汉人的关系。谈这个问题，是要有政治勇气的。

在清代，如何处理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是统治者无可回避又深感棘手的重大政治课题。《春秋正辞·外辞》系统地总结儒家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是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庄存与论夷夏之别，自不能轻视族属之分，但是他无疑强化了以思想文化形态和政治行为标准的区分方法。他认为，杞、郑、晋等诸侯国背信弃义，《春秋》视为夷狄。与此同时，他对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国颇有优容之意。所谓“秦以伯见，初非狄也”，词气之间温情脉脉。庄存与这样做，基本的动机不外乎为当代民族关系的格局寻找经典根据。论其积极意义，在于包含了种族平等的思想因素。这和古代儒家的观点实际已有不同。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2]这是说诸夏文明之先进是夷狄地区望尘莫及的。后世儒者多从中申出种族优劣之分。庄存与扬弃这些陈旧见解，真实的背景是汉、满等各民族经过长期交流与融合，文明程度之接近远远超过了古代。所以，他这样认识问题，并非出于逢迎朝廷的鄙陋动机。假如考虑庄存与的观念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两者恰恰是有差距的。清朝政府奉行的是民族歧视的政策。庄存与弘扬儒家的华夏文明本位思想，暗含着调整民族政策的要求。龚自珍盛赞庄存与之学“钩日于虞渊而悬之九天之上”，志欲“阴济天下”[23]，正指《春秋正辞》在这方面的贡献。

以上所举《春秋正辞》匡济时政的诸种要义，虽不能说没有遗漏，却可以展示庄存与治经的根本旨趣。忠实地诠释经典，热切地关怀现实，这是庄存与经学的优势所在，亦是其魅力所在。

三、敢开风气必为师

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评论庄存与的经学成就，往往并不特别推崇《春秋正辞》。当时一般人还不能充分认识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但是庄存与的宗人亲戚肯定已经悠然心会。刘逢禄、宋翔凤绍述并弘扬庄存与的《春秋》学，主要是出于理解与认同。因此，庄存与的学术思想最先是由他们发扬光大。后来龚自珍、魏源服膺今文经学，也是以刘、宋为中介。这种学术文化的传播过程是古代区域文化形成的习见模式。

常州学派的后继人物治学论政多有超越创始者之处。但是，他们都由衷称扬庄存与的经

学。探求原因，是庄存与确能得风气之先，启后学之路。常州学派的学术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然而它在许多方面始终保持着不变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总和便是一个学派的鲜明宗风。

庄存与深研汉学与宋学，又遍习群经，但是最终皈依《春秋》公羊学。这种选择，从切合世用方面看，是最为恰当的。庄存与在经解统绪方面取董仲舒之义理、何休之训诂、赵汸之义例，从“师法”角度看臻于纯而不杂。后来的常州学派经师多相沿不改。刘逢禄的代表作之一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这部书对于庄存与的《春秋》公羊学研究是补充也是发展。宋翔凤的代表作是《论语说义》，其要旨在于从《论语》中寻绎“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对于庄存与的《春秋》公羊学研究是丰富也是旁衍。龚自珍治《春秋》公羊学，于董仲舒之学用力甚多，成《春秋决事比》。另有扬州学人凌曙，受刘逢禄启发，勤治《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繁露》，著《公羊礼疏》。庄存与所宗经传及西汉人义说，无一不受后继者重视。至于赵汸《春秋属辞》无人顾盼，当是因为赵氏兼重三传，“家法”不严。

庄存与的《春秋》公羊学研究以“存大体”为主要着眼点，《春秋正辞》可称范例。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在解经方式上似乎又从“正列其义”回复到义例辨析，但在内容上还是专主于探求“礼义之大宗”。这部著作所列义例，较之赵汸的《春秋属辞》趋于简要，所关注的政治理论问题多与《春秋正辞》相同，而且观念上也多与庄存与吻合。刘逢禄作为常州学派前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义理研究方面严守学派门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完全依托一经一传立言，终不免受到束缚。所以，后来龚自珍、魏源论述儒学理论，每每摆脱“经义”式著述形式，迳自为文，畅所欲言。如龚氏《乙丙之际著议》、魏氏《默觚》是突出的实例。应当说，这是贯通经术与治术的坦途。

庄存与诠释《春秋》经与《公羊传》，非常重视据“微言”求“大义”。这种治学方法亦为常州学派后继者袭用。在这方面，魏源似乎最引人注目。他以“古微堂”作为书斋名号，足见他对此法的酷爱。他的《诗古微》和《书古微》都是很有分量的经学著作。两书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以“发微”方式系统解读《诗》、《书》的政治内涵，是他对常州今文经学的重大贡献。庄存与援据“微言”讲论“大义”，确实不乏独到见解。然而由于时势所限，他阐发“大义”的语言有时隐约难明，令人有“微乎其微”之叹。刘逢禄、宋翔凤以下诸人则趋向语风的清晰畅快。《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诛绝例》说：“《春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又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所谓礼义之大宗也。”这就比较明显地指出当世刑律中的“株连”之法有违《春秋》之义。宋翔凤《论语说义》卷4提出，尧、舜传贤，大禹传子，体制不同，而其“道”不殊。这个“道”就是“尚贤”。宋翔凤还说：“后世视天下之大为一家之私，至高而无上，穷泰而极侈，则废兴之际，是非之说纷焉。”这里公然否定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体制，在当时不失为“雄伟非常之论”。

考察《春秋正辞》的治学方法对常州学派后学的启示，可以确认庄存与是清代中期经学领域学风转变的先导。这种学风的理论指向，是重新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再考察《春秋正辞》的思想内涵对晚清学者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发现庄存与是一位初步具有近代意识的思想家。

庄存与解说《春秋》，接受了汉代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庄存与说：“《春秋》应天，受命作制。”㉔这一说法为董仲舒所倡：“《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㉕后来何休也说：“《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㉖汉代有人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帝制法”㉗。庄存与不取此说。他断言，《春秋》所含“王法”，适用于“治万世”。这不是漫为泛泛之论，而是在内心深处意识到改革现实社会的必要性。常州学派的主要成员始终以《春秋》公羊学为根本的经典依据，与此大有关系。孔子身为“布衣”之士，而可以“受天命”，“制一王之法”，这种说法隐含着“匹夫可以为百世师”的结论。治世法制的发明权由君王手中转移到民间。虽然在康有为之前还没有一位清代思想家敢于自命为制法之“素王”，鼓吹改制毕竟蔚然成风，改制的构想也层出不穷。在此过程中，常州学派无疑发挥了先锋作用。

《春秋正辞》所综理的儒家政治理论体系对晚清思想也有值得注意的影响。民族关系与

君民关系是晚清思想界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庄存与论中国各民族之文明进步与相互关系，以文化发展为首要依据。后来刘逢禄进而提出，一个民族只要有“文武贞信之教”，没有骄侈淫昏之风，即有理由主宰全国；假如它一旦失去优势，当然不应当处于统治地位。这就比较明确地指出清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失去合理性之后的必然命运。庄存与论君民关系，认为“天下”不是一家之“私产”，“圣所贵，贵其民”[28]。这对于后来民主思潮的勃兴也不无引导作用。庄存与所持政治立场，还是尊奉本朝皇室。他的学术理论，有历史的进步性，却不具备彻底的革命性，所以其影响范围主要限于晚清社会改良主义一派。

庄存与身后的近百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固然被统治者用作维护旧秩序的工具，同时其中某些方面又被先进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引为理论资源。《春秋》公羊学在近代久盛不衰，根本原因是其若干学术观点与方法可以为社会改革服务。庄存与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既是沟通古代《春秋》公羊学与近代公羊学的重要中介，又是近代《春秋》公羊学的发端。所以，尽管常州学派一代又一代继起名家思想日益精进，影响日见扩大，他们总是真诚地敬重庄存与这位独具远识的开拓者。

---

①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②《春秋正辞》收录于《皇清经解》。
③梁著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钱著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比如台湾学者张寿安著《以礼代理》一书。
⑤《鲒埼亭集外编》卷44，《答诸生问榕村学术札子》。
⑥方苞《安溪李相国逸事》，载《方苞集》集外文卷六。
⑦《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5。
⑧《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
⑨《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这一段话为王守仁所说。
⑩方东树《汉学商兑》。
⑪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序。
⑫臧庸《礼部侍郎庄公小传》，载《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⑬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载《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⑭转引自方东树《汉学商兑》；参见《戴东原集》卷11《题惠定宇授经图》。
⑮臧庸《礼部侍郎庄公小传》。
⑯《朱子语类》卷9。
⑰《春秋属辞》收录于《通志堂经解》。
⑱《史记·太史公自序》。
⑲《汉书·儒林传》。
⑳《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㉑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
㉒《论语·八佾》。
㉓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载《龚自珍全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㉔《春秋正辞·奉天辞》。
㉕《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㉖《春秋公羊解诂·隐公二年》。
㉗《春秋纬·说题辞》。
㉘《春秋正辞·奉天辞》引刘向语。

（作者田汉云：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邮编225002）

CONTENTS

1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Research in Qing Hist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S AND LAW

7 Zheng Yonghua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Secret Societies during the Years Leading to the 1911 Revolution

14 Chi Yunfei The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Officials Advocating Establishment of a Co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23 Zhao Xiaohua The Problem of Long – pending Legal Cases in the Late Qing

SOCIETY AND ECONOMY

32 Zhang Xiaoye The Problem of Anti – smuggling in the Qing Salt Administration

42 Tong Yonggong A Brief Commentary 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hengjing Ginseng Monopoly

50 Xu Hao The Management of Extensive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EARNING AND CULTURE

61 Tian Hanyu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Zhuang Cunyu' s *Correct Ver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qiu zhengci)

69 Shen Yan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Qing Collected Essays on Statecraft

RESEARCH ON POPULATION

75 Wang Weiping Foundling Homes in Jiangnan in the Qing Dynasty

86 Han Guanghu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ner Garrison at the Yuanmingyua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 of its Population

RESEARCH NOTES

91 Lü Xiaoxian Three Problems Regarding Qing Official Residences Paper (Di Bao)

97 Xi Yuan Narrative of Wang Cong' er Rebellion

BOOK REVIEWS AND TRENDS

105 Reviews 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18*th century*.

110 Zhu Hu Ghosts of Great Times —— a Review of P. Kuhn' s *Soul – stealers*

113 Ho Ping – 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 s Re – envisioning the Qing (Part One)

121 Liu Zhonghua A General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Qing Edition* (Qing Tonjian)

124 Xu Danliang A General Report o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